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封面设计：哈斯朝鲁

封面题字：魏 泉 琛

封面印章：李 子 良

乌兰察布文史资料 第五辑

编 辑：乌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封面印刷：丰 镇 县 印 刷 厂

内文印刷：丰 镇 县 印 刷 厂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坚持奋战大青山——怀念姚 吉同志

.....高克林 奎 璧 张达志

杨植霖 苏谦益 白成铭 黄 厚 (1)

大青山蒙汉人民的抗日斗争

.....阿 腾 (12)

①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始末

.....董其武 孙兰峰 (16)

②绥东抗战第一仗——红格尔图之役

.....董其武 (23)

③商都攻坚战

.....董其武 口述

凡 塞 杨格非 王国卿 整理 (26)

④绥东抗战的序幕

.....武殿林 (32)

忆大青山绥中专署一个紧急任务

.....成枫涛 (35)

大青山游击队坚持抗战的片断情况

.....察右后旗党史办 整理 (40)

〇回忆傅作义将军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怀柔战役亲历记

.....樊鹏翱 (48)

英雄的大青山

.....郝秀山 忆述

武川县党史办 整理 (86)

蜜汉山壮歌

.....蔡子萍 忆述

乔澍声 整理 (98)

青山埋忠骨 浩气凛千秋——回忆薛占海 魏志忠二烈士

.....吴拴柱 口述

黄润甲 整理 (108)

〇傅作义将军反攻绥远与日本侵略军制造广屹洞

和一间房惨案经过情况

.....周治平 (111)

为开辟国际交通路线而献身的郝登鸿同志

.....曹 晋 (119)

参加革命前后的片断回忆

..... 阎树春 (124)

战斗在敌人心脏

..... 王月娥 口述

刘耀冰 整理 (146)

在艰苦的岁月里

..... 熊祖芳 口述

刘耀冰 整理 (156)

傅作义军抗日战争的两个片断史料

..... 晋乐山 (160)

我所经历的傅作义部三十五军抗日史料

..... 晋乐山 (165)

盐池见闻 (之四)

..... 王再兴 (171)

铁骨忠魂——缅怀爸爸兼忆平定路北抗日斗争史实片断

..... 张继勇 (179)

蜈蚣坝伏击战

..... 张胜喜 秦补焕 (195)

日寇统治下的商都县城关镇

..... 赵忠东 李有軌 王 培 (201)

坚 持 奋 战 大 青 山

——怀念姚吉同志

高克林 奎 璧 张达志 杨植霖
苏谦益 白成铭 黄 厚

光阴荏苒，姚吉同志与世长辞已经三周年了，我们这些同他在大青山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都更加深切地怀念他。

我们同姚吉同志初次见面时，都深深地被他左脸上那道又长又宽的伤疤所吸引。这伤疤记载着他不平凡的经历，也凝聚着他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和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

姚吉同志一九〇六年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家里。自幼放牛、打柴、耕田，备尝艰辛。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担任邵阳二区乡农会主席。大革命失败以后，一九二七年他在黄公略、贺国中同志的率领下，参加了“平江暴动”，翌年入党。从此，他在彭德怀同志直接领导下，参加了艰苦的井冈山保卫战和打长沙、攻赣州以及保卫中央苏区的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在长征中，他先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和红三军团十二团团长，担负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的重任。红军到达陕北后，调他任陕北红军七十八师参谋长和独立师师长，参加了红军的东征和西征战役。在整个红军时期，他五次负伤，多次受到中央军委和军团的嘉奖和表扬，并授予他三级红星勋章。抗日战争时期，姚吉同志历任旅参谋长，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塞北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

员。全国解放后历任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曾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第四届人大代表和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姚喆同志从一九三八年秋开始，在塞北地区战斗工作了十五个春秋，为夺取绥蒙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艰苦奋斗，坚持创建大青山根据地

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于内蒙古中部，山南是富饶的土默川平原和联接华北的平绥铁路，山北是辽阔的大草原，一直伸向祖国北部边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毗邻。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前哨，也是通向苏蒙的国际要道。一九三七年九、十月份日本侵略军占领内蒙以后，在这一地区驻有一个旅团、四个伪蒙古骑兵师和大量的伪民团、伪警察。它严重地威胁着我陕甘宁、晋西北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安全。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一地区十分重视，曾多次给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发电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并且指出：“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敌人知其重要意义，必多方破坏，故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区创立根据地者”。贺龙、关向应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选派了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并由他们将三五八旅以王尚荣同志为团长的七一五团、一二〇师师部骑兵连和由武新宇同志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一批干部以及刘镛如同志领导的“动委会”第四支队，组成了李支队，即大青山支队。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李支队从晋西北的五寨县出发，开始向大青山进军。从此，开始

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长期、艰苦的斗争。

为了打击敌人的侵略气焰，扩大我军的影响，争取和发动群众，打开抗日局面，姚喆同志积极协助李井泉同志连续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几次战斗：九月初首先打开了陶林县城，歼敌一部。九月十日攻克了绥北重镇乌兰花，全歼守敌日伪军百余名，接着又在归绥至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坝伏击了日寇出援乌兰花的十余辆运兵汽车，歼敌八十余人。十月上旬在石拐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又袭击了三道营火车站。在大青山南麓沙尔沁和大青山中和山北的官地后窑子和广业公司等地袭击了敌人的据点，共消灭日伪军七百余人。这一连串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塞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使绥蒙民众的抗日情绪为之大振。

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加之地处寒带，严冬一到，雪深地冻，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寇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党中央、毛主席了解这一情况后，指示大青山游击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李井泉、姚喆同志坚定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姚喆同志在具体执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土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一部分马匹。有些蒙汉族群众听说八路军需要马匹打鬼子，有的青年就自带马匹来参军，有的自动献马献鞍具，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同原在大青山的骑兵游击队一起，便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

由于国民党长期纵匪害民，在大青山里几乎遍地是土匪。这些土匪已经成为我军深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严重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一九三九年春，姚喆同志率领部队，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在武川县官庄子一带聚歼了危害最烈的一股土匪干碗豆、于志谦等共两千余人，缴获了数百匹马和其它物资，解救出二、三百名被土匪掳去

的妇女。群众纷纷前来认妻领女，牵马赶羊，他们拉着战士们的手流着泪说：“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剿土匪，保护老百姓，真是咱们的大救星”。

一九三九年冬，绥远省委和骑兵支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重新布署了大青山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各地区的“动委会”，积极筹备政权建设。党、政、群等工作也随之进一步开展起来。大青山地区的军政领导工作，主要落在姚吉吉同志肩上，这时阎锡山在山西发动“晋西事变”，进攻新军，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同日寇勾结，在大青山频频制造事端，袭击我军枪杀我地方工作人员。我军忍无可忍，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妥协投降空气，并为民除害，姚吉吉同志组织指挥部队，在绥中和绥西、绥南分别集中兵力，同时行动，一举歼灭了“自卫军”总部和各路指挥机关及其主力八团、十二团和自卫军的绥南专署，俘虏了二千余名，缴枪一千余支，还缴获了自卫军三路总指挥王有功与日寇勾结投降的秘密信件。接着，又在绥中和绥西粉碎了顽军各一千余人的反扑，消灭、俘虏了一部，其余溃散逃窜。我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骑兵支队也从三个营发展为三个骑兵团。一九四一年冬，四支队改为骑支独立营，以后营建制撤销，分别编入了骑兵团。

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内蒙主要城镇和交通线的反动统治，并且使其不敢贸然南犯和北进。特别是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寇将大青山地区做为他们配合德国法西斯北犯苏联的后方基地，就更把大青山根据地看做是“心腹之患”。所以，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日寇对我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并且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一起进攻的所谓“总体战”，再加上叛徒的无耻出卖活动，更加重了当时的困难。姚吉吉同志领导大青山军民经受了这一严峻的考验。同敌人进行了上

百次战斗，打了不少漂亮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一九四二年秋季，日寇搜罗了所有驻绥远部队，并从华北专门调来两个机械化旅团，配有飞机、大炮，共达三万余众，对我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极其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我在大青山各地区的部队不过二千余人。敌人凭借数量上超过我十余倍的绝对优势，企图把我大青山部队全部吞掉。当时，姚喆同志正在绥西地区检查工作。在这危急关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达志同志率领支队机关及绥中部队，从敌人的夹缝中突出重围，胜利转移到绥南的蛮汉山一带继续坚持斗争。接着，根据晋绥分局的指示，绥蒙区党委及行署机关也相继从绥中转移到雁北。敌人企图消灭我绥中部队的计划破产了。接着就向我绥西地区疯狂扑来。姚喆同志面对如此强大而残暴的敌人，以他特有的镇定，沉着应战，利用绥西的有利地形，坚持同敌人斗争。一些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和他多次负伤的病残身体，在如此紧张艰苦的环境中难以支持，再三建议他回绥南支队司令部去。但他说：

“为了随时掌握这里的敌情变化，便于坚持斗争，我不能走。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战胜敌人，渡过难关。”他的话给了同志们极大的鼓舞。当严冬到来以后，困难更加严重。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中，部队经常无粮充饥，无房可住，伤病员无药治疗，并且几乎每天都要抗击敌人的袭击，有时一天就要转移几次，处境十分艰难和危险。但所有这些都未能动摇他坚持斗争的决心。为了减小目标，便于机动和解决食宿困难，姚喆同志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或班为单位单独活动。他自己也只带十几个人，在冰天雪地中，拖着伤残的身体，转战在大青山中。特别是他两臂伤疾作痛，难以骑马，而左眼则因刀伤不能闭合，终年流泪不止，加上塞北严冬风沙的吹打更加痛楚。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从绥西到绥中同敌人转圈子，检查指导各地的工作。他每到一处总是先看望当地坚持斗争的军民，告诉他们克服困难的办法，

鼓励大家认清形势，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大家在这异常艰苦危险的环境里，看见了姚司令员还坚持在大青山上同大家一起战斗，而且是那样的乐观自信，谈笑风声，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一九四三年夏，姚喆同志返回塞北分区和高克林同志继续领导雁北及大青山地区的对敌斗争，使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得到逐步恢复。一九四五年春，中央决定将塞北军分区改编为绥蒙军区，任命姚喆同志为司令员，高克林同志为政委，张达志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当时，姚喆同志正在参加“七大”，会议尚未结束，即奉命率领陕北骑兵旅，晋绥二十七团和九团，立即返回大青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接着组建了绥南、绥西、绥中、绥东四个军分区。八月遵照毛主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姚喆同志指挥绥蒙地区的步骑部队，昼夜兼程，向敌区挺进，配合晋绥和晋察冀部队，收复了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占领了平绥线除包头、归绥以外所有重要城镇。八年艰苦的、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姚喆同志率领绥蒙部队，继续坚持在大青山南北，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了三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解放了绥远全境。从此在绥远上空永远飘起了人民胜利的红旗。

严守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

大青山地区是蒙、汉、回民族聚居区。日寇侵入内蒙后，进一步制造民族纠纷，特别是制造和利用蒙汉族矛盾，实行“以华治华”和“分而治之”的反动统治，因此，能不能把蒙汉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关系到我军能否在大青山站住脚、扎下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姚喆同志十分重视并坚决贯彻执行党

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他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防止和克服大汉民族主义思想作风，对蒙古族同胞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尊重蒙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准部队进驻喇嘛庙、清真寺或教堂，不准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他经常要求部队要注意保护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对蒙古族牧民不征粮、不派款，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他不仅严格要求部队，而且还带头做民族团结的工作，他同蒙古族群众广交朋友，取得了蒙古族群众的尊敬和信任。有的同他结拜兄弟，不少人亲切地称他为“巴老汉”（姚喆同志在大青山时的代号是八〇五）。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揭穿了敌人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对我军的攻击和诬蔑。广大蒙、回族群众在各方面积极支援我军，为开创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夺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姚喆同志还亲自向一些较有影响的喇嘛和神甫做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有的还为我军提供情报，掩护伤病员，购买急需物资，对我军帮助很大。

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蒙族群众的工作，姚喆同志十分注意培养民族干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和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奎璧同志关系密切，情谊深厚，经常在一起推心置腹交换意见，互相磋商抗日大计。对贾力更和高凤英同志，无论在工作、战斗或生活方面，姚喆同志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关系十分融洽。为培养更多的民族干部，白如冰同志和姚喆同志从部队和地方选送了大批蒙族知识青年，专门派部队护送去延安民族学院学习。一九四一年冬，姚喆和杨植霖同志一起回延安汇报工作，毛主席表扬了大青山的工作。姚喆同志关心爱护民族干部和重视民族友谊的精神，深深地扎在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心中。

姚喆同志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对国民党军队和伪蒙军，做了大量耐心的艰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在大青山地区的部队数量很多，为了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姚

姚吉同志曾多次同他们的指挥官会晤，晓以民族大义，讲明利害关系，敦促他们整顿纪律，以利共同抗战。在他们有了抗日行动时，姚吉同志则从军事上、物资上给予援助。对于他们有意制造事端和限制、妨碍我军抗日活动时，则同他们坚决进行斗争。当国民党顽军在日寇的诱降和蒋介石“曲线救国”反动政策的唆使下，公开进行反共投敌活动时，姚吉同志曾多次给他们以警告，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则坚决贯彻自卫反击的原则，坚决给予打击。从而进一步团结教育了蒙汉各族各阶层人民群众，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游击根据地。

对于伪蒙军的工作，姚吉同志认真执行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的工作决定》，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地方工作关系，主动派人到伪蒙军中开展工作，争取了不少伪军官兵倾向我们。姚吉同志还亲自对伪蒙军二师师长韩伍和七师师长长胡子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工作，使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中立，并为我们在他们防区内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特别是韩伍给了我军很大帮助。

对于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姚吉同志积极协助地方组织认真执行“不推翻王公制度而是扶助王公抗日”的政策。当部队初次攻克绥北乌兰花镇时，将俘虏中属于蒙古贵族四子王爷的旗兵一百余人连同枪支马匹，全部交还给他，使这位王爷感激涕零。从此，他一直与我们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对于地（牧）主，姚吉同志从大青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合理负担”的原则，动员他们积极支援抗日。不少地（牧）主在我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为我捐粮捐款，捐献马匹和布匹、皮衣。有的一次献马二、三十匹，献粮二、三百石，有的代我部队囤粮积草，贮备给养，给了我军很大支援。

一九四九年秋，姚吉同志同高克林、杨植霖、奎璧、苏谦益等同志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对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政策

和关于“起义部队解放军化，绥远全境解放区化”的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他一心为党，胸怀坦荡，不以感情代替政策，更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得失，同起义将领开诚相见，主动接近，合作共事。在实现“两化”任务中，他认真执行政策，对起义人员，凡能痛改前非，接受改造，靠拢我党的，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对成见深，进步慢者，则循循善诱，耐心等待，促其转变；对少数抗拒改造阴谋破坏的反动分子，则坚持原则坚决斗争。就这样，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双方人员的共同努力，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使十万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于一九五一年，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在司令员董其武，政委高克林、副司令员姚喆同志的率领下，光荣地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夺取胜利

姚喆同志再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

姚喆同志经常教育部队要全心全意地相信和依靠大青山的蒙汉族群众，要求大家从每件“小事”做起，为群众谋利益。他总是尽量抽出时间坐在窝棚外面的石磨旁接待来访的各族群众，同他促膝谈心。他还经常和住地的老乡下棋聊天，有时登门串户，深入群众之中，了解人民生活疾苦，听取群众对我军的批评意见，随时解决问题。所以，在大青山根据地的许多村庄里，都有他的“好朋友”。群众对他也十分熟悉，亲切地称他“老姚”，或“我们的姚司令”。

姚喆同志时时关心群众利益。每次敌人进行扫荡时，他都首先关照地方干部和群众的转移。常常是把群众安排好以后，他才离开住地。一九四一年过春节时，他听说有两位地方干部住在司

司令部附近一个小村里，他担心发生意外，就派人把这两位同志请到司令部同他一起过春节。第二天敌人真的袭击了这个村子，这两位同志深深感到姚吉吉对地方同志的关怀。

为了减轻群众负担，他要求部队处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九四一年以后，敌人的扫荡十分频繁，部队在一个地方只能住两三天。但在农忙时，姚吉吉同志还带领部队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劳动。他自己一直坚持同群众同甘共苦，夏天他身着布衣，脚穿牛鼻子鞋，冬天披着羊皮袄，脚蹬毡疙瘩，从不特殊。老乡们指着他亲热地说：“你这身打扮哪象个司令员？倒和我们山里人一样。”在困难的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他和大家一样，每年只领一件上衣，裤子破了，补了又补，一年到头和衣而睡。从一九四三年以后，部队取消了小灶，他和战士一样到伙房打饭吃。他还经常亲自到伙房帮助炊事员出点子改善伙食。缺粮时，他同大家一起喝莜麦糊。敌人扫荡时，就和大家一起打窑洞，搭窝棚，挖野菜，吃野果。有时边吃边给周围的同志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鼓励大家战胜困难。尽管他和部队生活如此艰苦，但他还时刻惦记着晋绥和延安，他指示供给干部要把在大青山地区筹集到的重要物资尽量多上交一些给晋绥和延安。他坚决执行自力更生原则，从一九三九年以后，领导大青山部队节衣缩食，克服困难，利用战斗间隙助民劳动，并亲自参加一九四四年大生产运动，尽量减轻人民负担。

几十年过去了，姚吉吉同志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那颗关怀他人的心没有变。在十年动乱中，他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对于康生、“四人帮”对他的诬陷，他泰然处之。他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决。对于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姚吉吉同志热情如初，不冷淡，不疏远，并尽他之所能，给予照顾和庇护，使这些在动乱中倍受冷遇的同志得到很大的温暖，增强了渡过逆境的勇

气和信心。

一九七九年春，他的哮喘病发作了。当他接到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通知时，他抱病来京，同大家一道畅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共商国家大事，坚持到会议结束。在返回武汉途中，他突然休克，虽即返京抢救，终因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青山南北，蒙汉各族人民无不非常悲痛。人们怎能忘记同姚吉喆同志一起渡过的那些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怎能忘记他置身群众当中那种质朴无华，亲切感人的形象。为了缅怀姚吉喆同志的功绩，寄托各族人民的哀思，教育下一代，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和广大干部和群众，恳切希望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麓。武汉军区党委和姚吉喆同志家属给予了圆满的回答。在姚吉喆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内蒙古自治区派出代表，将他的骨灰接到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将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姚吉喆同志和所有为内蒙古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的名字，象苍莽的大青山一样巍峨永存！